

# 胜利

〔苏〕亚·恰科夫斯基著

第一卷

# 胜 利

## 第一卷

〔苏〕亚·恰科夫斯基著

施 达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Александр Чаковский

ПОБЕДА

*Книга первая*

本书根据«РОМАН ГАЗЕТА», 1979, № 14—15

Москва 版译出

胜 利

第一卷

〔苏〕亚·恰科夫斯基著  
施 达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

全国新华书店 经销

江苏丹徒人民彩印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13.75 字数 281,000

1982 年 4 月第 1 版 1987 年 5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 21,501—28700 册

书号 10188·264 定价：2.10 元

ISBN7-5327-0038-0 / .18

## 内 容 提 要

《胜利》是苏联当代作家，苏联作家协会理事会书记，《文学报》主编亚·恰科夫斯基继《围困》之后发表的一部以苏联外交活动为题材的多卷政治小说。全书共分三卷。

《胜利》以虚构人物苏联记者沃罗诺夫在采访赫尔辛基三十五国首脑会议(即欧安会)时与美国记者布赖特邂逅为序幕，展示了三十年前召开的波茨坦“三巨头”会议。作品着重描写了“三巨头”在会议桌上激烈、微妙的政治和外交斗争。书中出现的主要历史人物，在苏联方面有斯大林、莫洛托夫、维辛斯基等，而英美方面则有丘吉尔、杜鲁门、艾登、艾德礼、贝尔纳斯和哈里曼等。小说以波茨坦会议这一历史事件为中心，给读者提供了当时的一些具体场景。

DAS/116

## 目 次

第 一 章	前夜	1
第 二 章	往事	28
第 三 章	丘吉尔	77
第 四 章	杜鲁门	125
第 五 章	“现场效果”	178
第 六 章	斯大林	212
第 七 章	明天一觉醒来，他将是什么人？	253
第 八 章	在等待中	267
第 九 章	“Underground”	288
第 十 章	初会	312
第十一章	“终点”	344
第十二章	“伶俐的小孩”	374
第十三章	初寒	394

# 第一章

## 前夜

……就在这个时候，电话铃响了。

沃罗诺夫困惑不解地朝电话机瞥了一眼，心想：“这该是谁打的呢？”不错，在办理登记手续时，他留下了自己所住的饭店名称和房间号码，然而电话号码他谁都没有告诉，况且也没有谁向他问过。大概，这是那位参赞打来的吧？想问一下沃罗诺夫安顿的情况？当然，在苏联政府代表团到达的前夕，需要这位使馆工作人员操心的只能是他了。

沃罗诺夫从圈椅上向放着电话的搁架探过身去，拿起连在富有弹性的白色蜷线上的听筒。

“啊罗，”他竭力把这两个字说得让俄国人觉得是惯常使用的“啊喽”，而在外国人听来又近乎于英语的“哈罗”。

“是沃罗诺夫先生吗？”听筒里响起了陌生的男人声音。从他说话时带有鼻音和卷舌音发得比较生硬的腔调来听，不难猜出对方是个美国人。

“嗯，”沃罗诺夫用英语回答。

“马依克尔，是你吗？”美国人满心喜悦地重复了一句。

“到底是谁呢，真见鬼！”沃罗诺夫心里感到恼火。也许是

个西方记者？在那个熙熙攘攘的新闻中心里他和许多人打过招呼，尽管有些人他从未见过，至于另一些人他倒确实曾经在国外或者莫斯科有过一面之交。

“是我，”沃罗诺夫冷冷地回答。“您是谁啊？”

“唷，马依克尔！”电话里又传来了热情洋溢的声音。“听到你的声音我有多高兴啊，我在新闻中心天天都打听你的消息，终于听说你也在名单里面，只不过暂时还没有到，昨天我甚至打算溜到你们的……‘米哈伊尔·加里宁号’船上，可是连舷梯都没放我上去，直到刚才我才知道你在这儿。喂，马依克尔，我马上到你这儿来。行吗？”

这一串连珠炮式的话把沃罗诺夫彻底闹糊涂了。他相当了解许多美国人跟同行交谈时不拘礼节的特点。

可是跟他说话的到底是谁呢？

“你怎么不说话，马依克尔？”美国人问。这一次沃罗诺夫在他的口气里听到了不知是担忧还是委屈的意味。

“我不正在听您说吗，先生您是……”沃罗诺夫故意停顿了一下，想迫使陌生人说出自己的姓名。不过，即便对方自称是施密特、琼斯或者阿姆斯特朗，事情也不会因此而变得明白一些。沃罗诺夫一生中遇到过为数不少的施密特和琼斯，就是姓阿姆斯特朗的也绝对不止一个。他以为，多半是这个美国人在耍弄花招，企图旧事重提，说些几年前他俩在某某饭店大厅一起在电视里看过棒球或者橄榄球比赛之类的话，然后装出顺便的样子，打听一下勃列日涅夫先生将在什么时候到达。

“你叫我先生，马依克尔？”美国人泄气地说。“就是说，不

希望我到你这儿来？”他问，声音已经变得很轻。

“那……那为什么？”

“为什么？”在电话线另一端的那个人显然是苦恼地反问了一句，接着便一字一顿地说：“我想卖给你一块表。半价。就是勃兰登堡门旁要价两千马克的那种……”

“查理？……”沃罗诺夫用那突然变得麻木的手指紧紧握住了听筒，声音低得勉强才能听见。“查理？……是你？！”

“当然是我，马依克尔。”听筒里的声音重又变得活跃起来。“难道我没有告诉你，马依克尔，这是我，是我！”

“没有，没有……你没说……”沃罗诺夫慌乱地嘟囔着。

“得了，这无关紧要。那么我可以到你这儿来吗？”

“行，行，当然！”

“什么时候？”

“随你的便！现在，马上……”

“OK！我一到，就从下面给你打电话……”

“那又何必！直接到我房间里来！四楼，走廊尽头。听明白了？你听明白了？”

“OK！……”

听筒里响起了短促的嘟嘟声。沃罗诺夫放下听筒，但是没有摆到电话机上，而是把它搁在自己的膝盖上。他这样坐了有多长时间？一分钟？两分钟？很久很久？……

几个小时以前，沃罗诺夫还不太清楚，他安顿在饭店里，而不是在“米哈伊尔·加里宁号”的一个客舱里，究竟是占了便宜还是吃了亏。在最近几天之内，“加里宁号”将成为一座苏联的水上饭店。

直到“加里宁号”从列宁格勒启航的前一天，才弄清楚船上没有沃罗诺夫的位置。也许是中央各报为自己的记者争到了新的名额，也许是各种各样的顾问、专家以及秘书、打字员和速记员的人数有所增加，——不管情况是哪一种，反正船上没有为《外交政策》月刊的评论员米哈依尔·弗拉基米洛维奇·沃罗诺夫安排舱位，尽管他按时递交了申请。

杂志主编安东诺夫为此非常生气。他清楚地知道，事先不作预订，要在饭店里租到一个房间是谈何容易，更何况又是在一个将要发生具有世界意义的重大事件的城市里。然而，安东诺夫是个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人。当得知自己的评论员出国有可能告吹以后，他就向苏联驻赫尔辛基的使馆挂去了电话，找到了——当然经过不少周折——一位过去与他同时在国际关系学院毕业的参赞，并且借助于过去同窗的情谊，硬是请他答应了——当然还是费了一些口舌——为沃罗诺夫搞一个房间。

沃罗诺夫飞抵赫尔辛基的时候，离开会议开幕还有一天半。原先他没有到过芬兰，但就在机场上，在刚跨下舷梯的那一刻，他已经感觉到周围的气氛非同一般。

他那双见多识广的眼睛马上发现，这里有许多保安人员。不过，眼下这也是十分自然的事情。确实，这些保安人员与三年前沃罗诺夫随从勃列日涅夫出访美国时所见到的相比，外表就不那么引人注目，也不那么故意地显示身份。

美国人似乎违背了逻辑，把自己的保安措施搞得十分招摇。一辆辆警车拖着刺耳的警声呼啸而过；步话机里不时传出受天电干扰而失真的沙哑的声音。那些保安人员即便在相

距只有几公尺的时候，也照样使用步话机互相联络。身材魁梧的警察比比皆是，他们的蓝衬衫上别着金属号牌，大盖帽上钉有硕大的帽徽，腰间挂着带枪套的重型手枪——普通的自动手枪在美国被认为是不大可靠的武器。便衣们嚼着口香糖，身穿洁白的衬衫，颈脖上系着领带，敞开的深色上衣里边显然也挎着同样的重型手枪，他们首先关心的似乎是千万不要把他们跟普通的老百姓混同起来。

赫尔辛基机场上则完全是另外一种景象，尽管在未来的四十小时内这里将迎来许多国家的首脑。身着蓝灰色夏装的警察——虽然他们也为数不少——举止极为文雅，而他们那些穿便衣的同行，只有朝着走向机场大楼的旅客投去短促而警觉的目光时，才暴露出自己的身份。

机场上旗杆林立，不过旗帜要从明天起才能在上面飘扬。

叫出租汽车的钱沃罗诺夫身上当然是不会有：象往常一样，出差预算中没有市区游览的款项。但是沃罗诺夫懂得两种语言——英语和德语，随身所带也只有一只小小的手提箱。乘坐公共车辆去苏联使馆对他来说没有什么特别的困难。

大站快车迅速地把沃罗诺夫送到了市中心。为了保险起见，他先用德语，旋即又改用英语向迎面而来的第一位行人问路。那人详细地向他说明了去苏联使馆所在的捷赫坦卡图街要乘什么车，或者步行的话应该怎么走。

沃罗诺夫是徒步走去的——他想浏览一下这个从未涉足过的城市。芬兰首都的宁静以及它和俄国古老的省城之间难以捉摸的相似博得了他的喜爱。

从某个时候开始，沃罗诺夫变得极为厌恶西方的大城市，尤其是那些首都。近二十年来，他几乎跑遍了它们中的绝大部分。

他的这种厌恶情绪并不是一下子产生的。起先，西方的首都在他心目中倒也不无好感。沃罗诺夫住宿的饭店一般价格都不十分昂贵，然而条件却相当舒适。那些五光十色的橱窗、市中心街道和广场上似乎是节日般繁华的景象他也颇为欣赏。

后来，情况突然起了转折。沃罗诺夫甚至记得转折的确切时间。那是在六十年代末期，编辑部派他撰写几篇《今日美国》的特写。无论作为一名外交记者，还是一个普通的旅游爱好者，这样的一次出差都深深地吸引着他。那时候他对旅行还是兴致勃勃——要知道，当初他比现在几乎年轻十岁……他将从纽约出发，横贯美国，直至旧金山，中间在华盛顿、克利夫兰、芝加哥、波士顿和洛杉矶等地稍作停留。其中沃罗诺夫特别希望去的是旧金山。他乘飞机到达那里的时间是下午，摸到那家在纽约时一位熟悉的记者向他推荐的饭店以后，便匆匆地刮过脸，洗完澡，换上衬衫，急不可耐地想赶在天黑之前到这座久闻大名的城市里一游了。

当他下到饭店的前厅准备出去散步的时候，已经是晚上八点多了。

“这儿离市中心远不远？”他问饭店的看门人。

“不远，先生。乘车十到十五分钟就够了。”

“步行呢？”

“您究竟要去什么地方，先生？”

“不去什么地方，就在市中心随便走走。”

看门人朝沃罗诺夫投来了惊奇的、或者确切地说是戒备的目光，但仍然彬彬有礼地说：

“步行也用不了半个小时。您看……”

他把手伸向面前的一叠卡片——西方的任何一个饭店都备有类似的卡片。卡片正面印有饭店名称及其通讯地址、电报挂号、电话号码和电传号码；反面是一张袖珍地图，上面用黑色大圆点或十字符号标出饭店的位置，还绘有周围的主要街道。

“您看，”看门人重复了一遍，用圆珠笔在地图上划了个半圆。“这是主要的商业中心。不过现在商店都已经关门了。”

“谢谢。我不打算买什么，只是随便走走罢了。”

沃罗诺夫说着，接过了递给他的那张卡片。他快要走到门口的时候，看门人突然轻声叫住了他：

“先生！”

“怎么？”沃罗诺夫停下了脚步。

“要是您想溜达溜达，那我建议您在十点钟以前回来。”他望了望墙上的挂钟，时针正指在八点半上。

“为什么？”沃罗诺夫诧异地问。“难道你们夜里关门？”

“啊，不是这样，先生，”看门人微微一笑，“您什么时候回来都可以，不过……”他脸上的笑容消失了，两肩稍稍一耸。“一个人在十点钟以后逛马路……”

“您怕我被绑架？”沃罗诺夫也是微微一笑，以为柜台后面的人在开玩笑。“那可是白费劲，赎金是不会有的。”

他向看门人挥手告别，来到了外面的马路上。待他进入

市中心时，差不多都九点了。在市街的拐角处，他看见有家理发店还开着，不由想起自己已经快三个星期没有理发了。

一个虎着脸、仿佛在生闷气的日本人正给一名坐在——确切地说，是半躺在——理发椅上的顾客理发。沃罗诺夫只得在一侧等着。理发加上等候的时间，总共大约花了四十分钟。沃罗诺夫向日本人付过钱，然后照着地图来到了市中心的大街上。他刚踏上那条马路，便暗暗感到吃惊……

橱窗里灯光灿烂，然而马路上却空无人影，仿佛有一只巨大的手掌在上面抹了一遍，攫走了人行道上的一切生命。简直无法理解，这些招徕顾客的橱窗在为谁大放光明？那霓虹灯的广告又是在为谁闪烁不停？……一个人也没有。只有车身长而扁的汽车一辆辆地疾驶而过。

沃罗诺夫只觉得一种朦胧的恐惧正渐渐向他袭来。他清楚地知道，几乎在西方的每个都市里都有一些不是万不得已最好不要贸然问津的地方。譬如说，去纽约的哈莱姆区没有一个朋友或者熟人的陪同（这人还一定得是黑人），就很不安全。在伦敦的索霍和巴黎的比加尔特别容易卷入殴斗。假若你被牵连进去，那也只能怪怨自己——谁让你上那儿去的！……

但这里，在旧金山的市中心，使沃罗诺夫感到害怕的却是另一种东西：异乎寻常的孤单。他孑然一身走在望不到头的灯火辉煌的马路上，而时间还不到晚上十点。

他机械地移动双脚，眼睛不时张望着橱窗，然而对里面的陈设却一无印象。过了一会，他听到了远处隐隐的脚步声。不知是谁的鞋跟很有节奏地踩在人行道上，发出橐橐的响声。从

远处迎面走来了一个人。沃罗诺夫似乎觉得，那人一看见他，便放慢了脚步。自己也不知什么缘故，沃罗诺夫也慢了下来。那人把右手伸进口袋。沃罗诺夫几乎下意识地做了一个同样的动作。“应当拐进附近的胡同，转回去……”他暗暗地对自己说，可是脚还继续在往前走。假如兔子在蟒蛇面前果真只能听天由命的话，那末沃罗诺夫现在正是这样的一只兔子。“他口袋里藏着什么？”他寻思着，“手枪？折刀？铁护手？”他们之间的距离在慢慢地、然而不断地缩短。沃罗诺夫站住了。他没有把手从口袋里掏出来，装出一副观看橱窗的样子，一面不时稍稍侧过头去，斜睨着那个渐渐走近的人。

不，沃罗诺夫不是胆小鬼。整个战争期间，他是在前线度过的。可是这里的情况完全不同。在一个有几十万人口的城市里，马路上竟然如此空空荡荡，况且时间只不过晚上十点。（难怪看门人要预先对他提出警告，但是他却没有把这当作一回事。）

这时候，那个人一步步地越走越近了。鞋跟踩在路面上很有节奏的橐橐声越来越清晰。

“要是他向我扑来，我该怎么办？”沃罗诺夫转着念头，“主要的是，不能让他从背后先下手。只要他的行动稍有可疑，我就及时转过身来。不过，要是他口袋里藏有武器的话……”

那个人现在走得非常的慢，他那双高帮皮鞋的后跟沉闷而稀落地踩在人行道上。沃罗诺夫的神经紧张到了极点。他和那个缓缓过来的人相隔已经不超过三十米了。这是一个肩膀宽阔的中年男子，穿一套闪光合成纤维的深色单衣——在这个季节，换了第二、第三个美国人也照样会有如此的装束。

当他们之间的距离缩短到只有几米的时候，那个人突然从人行道上跨到——确切地说，是跳到——马路上，冒着几乎被汽车撞倒的危险，穿过马路，沿着对面的人行道迅速朝前走去。现在他鞋跟踩出的声音变得细碎而急迫。沃罗诺夫如释重负地望了望他的背影，不禁哑然失笑。那个人显然以为他，沃罗诺夫，在守候他，只是装出一副观看橱窗的样子罢了，实际上却企图来个突然袭击。他的神经忍受不住了，于是，没等走近橱窗就穿越马路到了对面。谁也没有袭击别人的打算，但双方都感到害怕，害怕着自己的对方……

经历了这件事情以后，每当沃罗诺夫来到西方国家的首都或者大城市，行经市中心的广场和马路时，不用说晚上，即便周围还是人头攒动，车水马龙，他也时时担心着明火执杖的突然抢劫。

也许，原因在于晚上聚集在这些广场和街道上的人们近年来外表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他们中的大多数看上去都是不修边幅，贴身穿着奇形怪状、邋里邋遢的绒衣，衬衫下摆不束进裤腰，而只是在肚子上面打起一个结，蓝斜纹布牛仔裤的臀部和两膝人为地用机器磨得油光发亮，光脚上一双凉鞋，再加上一件满是油迹、破破烂烂的皮茄克……他们的头发不仅长，而且全都蓬松散乱，油腻不堪，好象几个月没有洗似的。

沃罗诺夫从不以貌取人。他出身在一个工人家庭，又在这样的环境里度过了童年和青年时代。他尝过贫困的滋味，穿过父亲穿下来改过的衣服。

在战后的年代里，他不时发现自己对年轻的外交记者和所有那些衣冠楚楚、彬彬有礼、冷嘲热讽、自以为是、不知饥饿

为何物，也从未听到过子弹呼啸的初出茅庐的外交官怀有一种莫名的厌恶……

沃罗诺夫竭力想消除这种成见，常常在心里责怪自己，因为他知道在年轻的外交记者中有一些优秀的、严肃的、很有学问、并且富有事业心的人……但是青少年时代的经历在他所有的好恶上都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这些衣衫邋遢、裤子油亮的年轻人显然不能和他们的外表企图给人的印象混为一谈。他们的为人并非如此，只不过是装扮成这副模样罢了。

他们三五成群地在人行道上游逛，久久地坐在高楼大厦的台阶上、纪念碑的花岗石底座上和教堂的门口消磨时光……这些青年男女相貌粗犷，双唇紧闭，目光古怪，仿佛他们中的任何人随时随地都可能干出开冷枪、捅刀子、动拳头、用手掌侧面打人的事来。沃罗诺夫知道，这些故意衣着褴褛、摆出一副挑衅寻事样子的人，其中大多数根本没有什么抢劫的念头，他们的整个外表无非是一种时髦，而有时，则是对饱暖思淫乐的富人世界进行抗议的一种特殊形式。他自己也不止一次地写文章论述过当代的西方青年，谈到这些形形色色的嬉皮士、超嬉皮士和专事鼓吹爱情与和平的嬉皮士，揭示他们的社会根源，并进行了分析……但是一旦置身于他们周围，心里总是惴惴不安，并且感到莫名的恐惧。

也许正因为这样，他对芬兰首都在一见之下便充满了好感。

沃罗诺夫在宁静而整洁的市街上走着，迎面过来的行人

神态从容，穿戴正常，看上去心地善良。橱窗里琳琅满目，但是在布置上也不象其他一些西方国家的首都那样大做广告和极力兜售，以致看了常常使人索然无味，而是显得雅致、富于理智、符合人们的正常需要。

毫无疑问，沃罗诺夫更加希望他前来采访的这一必将载入史册的事件能发生在莫斯科或者某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首都，只有这样才算公正。正是社会主义世界多年来以极大的毅力和耐心，有条不紊、坚持不懈地向另一个世界表明，这样的会晤是必不可少的。

但是，沃罗诺夫懂得，这样的会晤不可能在莫斯科，也不可能在索非亚、华沙或者其他什么社会主义国家的首都举行，另一部分人是不会去那里参加会晤的。在所有西方国家中，芬兰堪称与社会主义世界和平共处、睦邻友好的楷模。它是资本主义世界的一部分，没有参加任何集团，从而保持了独立的地位，同时，无论是与西方还是东方，它都乐意发展贸易往来……正是芬兰提出了在自己首都举行会晤的建议。嗣后，苏联、几乎欧洲所有的国家、美国和加拿大都陆续对此表示同意，所有这一切当然绝不是偶然的。

……沃罗诺夫仍然不时地向行人问路。没过多久，他便来到了苏联大使馆。

但是，进入使馆大楼却不是件容易的事情。这几天内，所有外交使团的驻地都采取了理所当然的保安措施。这里自然也是严加防范。不言而喻，沃罗诺夫还不知道苏联代表团团长列·伊·勃列日涅夫将在苏联大使馆下榻。然而，使馆人员已经得到了通知。值班的警长在放沃罗诺夫进去之前，把